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曾琳智 著

“枪炮”或“玫瑰”？

公共外交中的音乐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書店出版社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曾琳智 著

“枪炮”或“玫瑰”？

公共外交中的音乐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書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枪炮”或“玫瑰”?：公共外交中的音乐 / 曾琳智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4
ISBN 978-7-5458-1776-8

I. ①枪… II. ①曾… III. ①音乐文化—文化交流—
中外关系—研究 IV. ①J6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27100 号

责任编辑 王 郡

封面设计 夏 芳

“枪炮”或“玫瑰”?

——公共外交中的音乐

曾琳智 著

出 版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50,000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1776-8/J.433
定 价 78.00 元

内容提要

音乐和公共外交分属不同学术领域，在公共外交的开展实施及推进过程中，音乐及音乐事件会产生一定的作用。本书发掘外交与音乐之间“共振”的内在脉络和深层缘由，可为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提供“心”的视角。本文融合了建构主义、软权力等相关理论，分析了音乐在公共外交中承担的角色，探索了艺术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在公共外交中，音乐或担任“政治先锋”和“观念大使”角色，开启善意对话、软化敌对情绪，促进观念认同，犹似“枪炮”攻心；或担任“身份标识”和“文化桥梁”角色，塑造身份认同、分享不同文明、增进相互信任，如同“玫瑰”余香。对于不可言说之深层次音乐艺术背后的探寻，亦有助于开拓不同文明之间的心灵话语沟通研究。对于中华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国文化传播及公共外交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书是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中心研究成果之一，是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音乐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的运用研究》（项目编号2017M611434）阶段性研究成果

“枪炮”或“玫瑰”？
公共外交中的音乐



序 一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构想的推出,中国的大国形象赢得了世界的瞩目。新形势下,如何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促进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认知,推动中国同世界的良性互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课题。中国未来的发展要赢得世界共鸣,文化差异是必须破除的瓶颈。中国文化要走出去、走进去,比传播更重要的是沟通,而音乐是一种消除偏见与隔阂,跨文化沟通最好的方式。

曾琳智博士的论文切入点可以说是应时而生。国际政治主流学派重视理性假设,着重于权力、经济、安全等“硬”的内容,忽视人的心灵、情感等“软”因素的研究。对艺术的研究往往能促使我们思考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中被忽视的内容:艺术与权力的博弈、人性善与恶的交锋、国家个体与人类共同体命运的冲突与平衡等。国内极少有人从学术角度来探讨音乐与国际政治课题,可以说这个问题视角非常新颖,但也意味着难度颇大。前期文献极少,几乎无章可循,而且需要作者不仅熟谙音乐理论及传播学相关知识,还要能驾驭大国关系与公共外交研究。尽管前路艰难,她依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一话题,用勤奋的汗水弥补其知识结构的不足。博士三年期间,她大量阅读相关资料,恶补不同学科知识,常常与我交流。博士二年级,她申请去美国访

学,搜集了许多宝贵的资料,文中文献综述部分可见其花费的巨大心力。在她的论文中,融合了建构主义、软权力等相关理论,以中、美、俄三个大国的音乐外交互动作为案例,分析了音乐在公共外交中扮演的角色,探索了艺术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或许由于其花在前期文献搜集和调研上的时间太长,文章对美国、俄罗斯(苏)在音乐外交关系上的探讨较为鞭辟入里,而在中国作为国际关系主体如何用音乐的方式参与对外关系进程这一部分显得较为薄弱,意犹未尽。无论从现实意义还是学术价值上来说,这部分是有待深入挖掘的。她告诉我目前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流动站跟随孟建教授,就这一方向在进行进一步探索,我很欣慰,也很期待看到她的研究成果。

曾琳智博士原来是研究外国文学的,在音乐上也有一定造诣,曾为一些电视剧和歌星创作音乐,并众筹制作了自己的原创音乐专辑《最美的年华》。博士期间从事国际关系学研究,诚然是一个大跨度的转变,但这种跨学科研究结合了其学术专长,开拓了国际关系学新视野,亦具有文学的底蕴与艺术的灵性。她的学术研究亦与她的创作风格相得益彰,呈现出细腻、细致、细巧、细密的独特风格。作为其博士生导师,我见证了她上下求索、极为认真的学术探索过程,我认为她至少为后来者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做了前期的奠基性工作。希望读者在给予本书关心、关注的同时,也能提出宝贵意见。

吴友富

上海外国语大学前党委书记、上海国际战略研究会副会长,教授

、 2018年5月20日

序 二

这是一本独特的研究专著。这种独特,一方面来自研究角度的独特,另一方面来自研究发现的独特。

中国已经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正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中国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国际社会中的一些焦灼、一些疑虑、一些误解、甚至是一些挑战,也会接踵而来,如近来西方“锐实力(sharp power)”就作为中国威胁论的新变种在粉墨登场。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如何学会与世界对话?一个迅速发展的大国,如何与世界沟通?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习近平主席说“要着力推进国家传播能力的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曾琳智博士的著作《“枪炮”或“玫瑰”——公共外交中的音乐》对于推进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增进中外文化交流融合,都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作为曾琳智博士后的指导老师,之所以鼓励她进行这样的学术研究,就是要让她的研究去努力践行“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当下学术研究正在呈现出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从单学科、多学科、跨学科，进入了“超学科”的阶段。“超学科”主要是指，在某一领域的研究中，让不同的学科在这一研究领域充分汇流激荡，最终实现学术研究上的“临界突破”。为加快我国文化创新体系建设，切实提高文化自主创新能力，2015年5月经文化部批准，在复旦大学正式成立了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作为中心主任，我带领团队围绕着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开展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曾琳智博士，作为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的博士后和研究专家，在跨文化传播研究、国际关系研究、音乐研究等不同学科之间倾力进行着跨界融合的研究，力求获得学术研究的“临界突破”。这本基于她博士论文研究基础之上完成的著作，对于如何理解国际关系的复杂性、观念建构的体系性、艺术传播的独特性等都很大启迪。

目前，曾琳智博士在中心继续拓展着中国音乐跨文化传播的重要研究，并成功申请到了博士后面基金的资助。多年来，她对于这个领域的不懈探索，取得了很好业绩。再之她本人也是一个音乐创作人，她对音乐的独到悟性和深刻理解，都让她的研究带上了特殊的专业色彩。我非常欣赏她大胆创新的学术探索精神、严细认真的学术研究态度。我希冀她在今后的学术探寻中，不断攀升新高度，不断取得新成就。

孟 建

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教授

· 2018年5月24日

序 三

曾琳智老师的《枪炮或玫瑰：公共外交中的音乐》专著即将正式出版，在此谨表祝贺。

曾老师本科专修新闻学，硕士研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师从时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的吴友富教授，主攻国际关系，博士后又随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孟建教授，在该校新闻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国家文化创新中心继续深造。详述曾老师的学历背景，是想说明在她身上极具现代意义的跨学科特质，且对她的成长颇有影响。

近年来与曾老师的接触交流中，还了解到她也是一位音乐创作者和业余歌手，早在2001年就曾获湖南省音乐协会举办的吉他弹唱大赛第一名。这些年又为多部电视剧主题曲填词，最近的是去年在各大卫视播放的谍战剧《剃刀边缘》主题歌。曾老师还制作过自己的原创音乐专辑《最美的年华》，她创作的一些音乐作品曾多次在全国和上海音乐活动中获奖。历数她的音乐背景，是想说明在她身上极富现代意义的创新创作特质，且对她的成长产生着另一重影响。

我大学主修英美文学，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曾经的文艺青年，大概青年都是文艺的），当时还翻译了一些国外的诗论和诗歌，其中有的还在十多年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我深深地感知，从事文学理论和批

评与从事创作的作家、诗人走的是两条道。做学问与搞创作若能在一个人身上完满的结合，属难上加难，而有冲撞、有挣扎、有纠结，则属正常又正常。曾老师能把她音乐创作的领悟、感受结合到国际关系、外交学的学问，也许是找到一个不错的结合点。但毕竟学问的严谨规范之重之繁会压抑创作的才气灵韵。多重分裂的影响，如何让人执着地坚守自己的心路方向，对曾老师来说，不知是一道有解还是无解的题。但从她这部专著的深处，我感受到的是她有意识抑或无意识地不时在与自己心灵约会对话。这部专著既是学问之作又是心灵之歌，实属难得。

公共外交是当代国际关系和外交里的一个新领域，公共外交与官方外交的并存及其结合构建了现代外交的完整景观。我二十多年来，因工作关系，长期在中国曾经驻外的一些老大使身边，深受他们的言传教诲。他们告诉我，实际上外交官大使原意为传递信息的使者，在官方外交、公共外交之前就有了民间外交或更早的人文交流，以人文为渠道的往来，增进了各国各民族的理解和友谊。曾老师的专著探讨了外交中音乐的作用，并将其概括为“政治先锋”和“观念大使”、“身份标识”和“文化桥梁”，即“枪炮论”和“玫瑰论”，前者用于试探政治意图，开启善意对话，软化敌对情绪；后者用于塑造国家形象，加强文化认同，增加彼此信任。但因“枪炮论”的历史梳理实证多聚焦在美苏冷战期间，故一些结论对音乐作为斗争性的“武器”色彩较浓，偏某种程式化的“政治正确”，更贴近官方外交，由此可能弱化了“玫瑰论”中音乐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探寻、对人类美好生活的追求这样更适合公共外交的普遍价值。看来理论抽象的概念远难以呈现音乐艺术的精彩。相比较而言，在当今和平和发展为世界主流，中国领导人倡导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背景下，曾老师专著在结尾部分探讨音乐观念的模糊性、审美性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张力，寻求现

代外交尤其是人文外交中音乐外交的潜力和模式,这似乎更具开放性的创新意义和价值体现。

之所以在这里我以外交置换了公共外交的概念,是因为有时感觉现在官方外交经常与公共外交捆绑在了一起,其界线越来越模糊,尤其在音乐外交层面上。当代国际关系史里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音乐外交就表现出这样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两国领导人基于中、美、苏关系的变化和外交战略的需要,启动了两国的秘密谈判。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7月16日发表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公告。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的欢迎,毛泽东主席与他在中南海进行了会面。2月28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宣布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而在1971基辛格访华后,美国费城交响乐团音乐总监、著名指挥家尤金·奥曼迪就写信给尼克松总统,建议乐团去中国演出。经过两年的协调,1973年9月费城交响乐团成为了第一个到中国访问演出的美国交响乐团。这一段史实曾老师在专著中也有提及,但未及展开。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期间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在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为邓小平访美举行盛大的专场文艺晚会,邓小平在晚会现场宣布了波士顿交响乐团随即访华的消息,当场肯尼迪艺术中心内掌声雷动。1979年3月,波士顿交响乐团又成为了中美建交后第一个访华的美国交响乐团,当时的乐团指挥是出生在中国沈阳,幼年曾在北京居住过,对中国有着特殊感情的美籍日本小泽征尔。

无论是美国两个交响乐团在中美建交前后访华还是美方为邓小平访美举行的文艺晚会,其中都有不少细节,颇能让人体会音乐外交的独特魅力和“弦外之音”。邓小平访美那场文艺晚会的最后一个节

目,美方安排的是约 200 名美国小学生用中文合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称:“他们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这是毛泽东版本的‘代我问候百老汇’”。一曲唱罢,邓小平深深为之动情,他和夫人卓琳走上舞台热情拥抱和亲吻了美国孩子,此真诚之举得到美国媒体和民众普遍好评。而美国费城交响乐团的访华演出当年被《纽约时报》描述为,如果说“乒乓外交”为尼克松 1972 年访华铺路,开启中美外交新局面,那么正是费城交响乐团的访华之旅,真正将两国粘合在了一起。后来的波士顿交响乐团来访,邓小平和宋庆龄都亲自出席捧场了北京首演,中国著名指挥家郑小瑛将其称作“友谊和音乐艺术交流的动人篇章”。

为什么是西方古典音乐,而不是芭蕾舞团或其他艺术团体,作为美国文化的代表在中美关系破冰、建交的一些关键时刻率先访问中国?当年陪同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又作为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的首批工作人员,直接参与并安排了费城交响乐团访华的职业外交官卜励德(Nicholas Platt)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首先中国人更崇尚集体行为,交响乐代表了最有创造性的集体艺术行为。其次,中国人喜欢大的东西,大的建筑,大的宴会,中国人热爱主题音乐,交响乐无疑是宏大叙事的主题音乐。最后,他还有一个大胆的个人猜测,就是觉得似乎在中国艺术传统中存在着一个抽象表达的空洞,而西方古典音乐恰好充填了这个洞。

美国两个交响乐团在华的演出曲目选择也很有意思。在西方古典音乐上,两家都选有贝多芬的交响曲,1973 年初选为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后因江青干扰,改为演奏贝多芬《第六交响曲》;1979 年则成功上演贝多芬《第五交响曲》。费城交响乐团首访北京,后为上海;波士顿交响乐团首访上海,后才北京,两地演出的曲目也有所不同。两家的演出中都选有中国乐曲,1973 年为钢琴协奏曲《黄河》;1979 年为琵

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返场时加演了当时中国人家喻户晓的《白毛女》组曲选段《红头绳》，据称喜形于色的观众当时终于按捺不住兴奋的情绪，即席报以春雷般的掌声。由此折射的“文革”前后、改革前后的意识形态，我们可以发现文化的语言和政治的语言居然如此深深地交织在了一起，而音乐又如何巧妙地穿越夹缝甚至黑洞透亮着其共享的人性光芒。

有关美国两个交响乐团访华的媒体报道还涉及到中国著名的弦乐曲《二泉映月》。1973年，费城交响乐团来访期间前往中国中央交响乐团交流，观看该团由中国著名指挥家李德伦指挥排练《二泉映月》，美国指挥家尤金·奥曼迪对此乐曲非常欣赏，向李德伦提出，希望得到这首乐曲的总谱，但我方婉转回避了美方的多次请求。1979年波士顿交响乐团来访，一些媒体也都提到美国指挥家小泽征尔和《二泉映月》。可能是久远的记忆模糊了，实际上在此之前小泽征尔1976和1978年曾两次来华。1978年6月，小泽征尔访问北京，他指挥中央乐团演奏了弦乐合奏《二泉映月》，大获成功。第二天，小泽征尔到中央音乐学院访问，顺便听了《二泉映月》的二胡独奏。当时民乐系17岁女学生姜建华（现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著名二胡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员）的演奏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小泽征尔听着听着，情不自禁，掩面而泣。突然，他从坐着的椅子上顺势跪下去，虔诚地说：“这种音乐应当跪下去听，坐着和站着听，都是极不恭敬的。”曲终后，小泽征尔泪流满面地站起来，对姜建华深情地鞠了一躬，说：“谢谢你的演奏，要是早一点听到你的二胡演奏，我昨天是根本不敢指挥乐队演奏的。”这就是著名的小泽征尔跪听《二泉映月》的历史典故。此后，在他的演出中，很多次《二泉映月》都成了保留节目。正是在他身体力行的宣扬下，《二泉映月》被国际乐坛公认为世界10大不朽名曲之一。中国著名作曲家吴祖强评价说：“作为曲作者，我认为，小泽征尔指挥的《二泉映

月》是最令人感动和发自内心的。”由此可见古往今来音乐沟通人类感情难得一见的美妙境界。

1973年费城交响乐团访问时还有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细节，也许更值得回味。当乐团访问上海时，中方安排了旅游购物的环节。乐团小提琴手帕斯奎勒(Robert De Pasquale)在逛街时，突然听到了小提琴声。他走进建筑物，上楼找到了正在练琴的学生，给这个惶恐的孩子上了一个小时的课。值得注意，这是改革开放前“文革”的时期，美国媒体报道称当时的中国“是禁欲的和清教徒式的”。但即使是在样群一个时代，音乐的无国界，其对人类心灵的沟通，记忆的唤醒，美感的享受，感情的共鸣，意义的传递，都展现出它无限巨大的穿透力。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美建交的历史上，中国人喜谈“乒乓外交”，美国人爱谈“音乐外交”。这大概也是曾老师的专著撩发我如此思绪漫游，钩沉考证的缘故，它也让我回想起自己大学时光里，作为“文革”后“新三届”79届的大学生，在拥挤的宿舍里和室友一起用音质很差的收音机(录音机)一遍又一遍地收听西方古典音乐，且以此为时尚的历历往事。其实就外交而言，无论是民间外交、公共外交，还是官方外交，都源于或离不开人与人的来往交流，即人文外交。而音乐外交则是人文外交中的重要内容，时常是必选项，非备选项。

《陈丹青音乐笔记》中曾讲到，叔本华谈音乐，以为即便没有人类，宇宙间也会有音乐，此话虽是在人间说的，但却点出了音乐的神性。我们现在谈论音乐外交，其实更多说的是与音乐有关的人和事，而非音乐本身，这自然就会勾连到特定的时代、事件。日前随手翻到我老师曹大鹏教授当年翻译的《文化论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其中有一章标题为“音乐与真理，不可过度”(Music and Truth ma non troppo)，讲到冷战时期美国情报部门推出“真理项目”(The Truth Campaign)，涉及以音乐为工具，开展文化冷战。但若音乐成为工具，就远离音乐的

神性和本性了,也无法从容、不可过度(*ma non troppo*)。当代作家、画家、陈丹青的老师木心曾言:“与战争相反的是音乐,到任何一个偏僻的国族,每闻音乐,尤其是童年时代就谙熟的音乐,便似迷航的风雨之夜,蓦然靠着了故乡的埠岸,有人在雨丝风片中等着我回家。”这大概也是我以为音乐与人文外交、公共外交更贴切的理由,尤其是在我们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并不是每一件算得出来的事,都有意义,也不是每一件有意义的事,都能够被算出来。”曾老师也许相当一段时间里还会为做学问与搞创作的矛盾而苦苦寻觅,但毕竟世上道理太多,道太远,人间可完美的,唯有真心,某种混沌模糊之间可能正孕育着创新的意义和价值。全球化时代,真实虚拟的世界,多元的文化,基于人类情感和集体记忆的音乐伦理能否构架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的沟通对话交流希望之路,值得我们陪伴着曾老师这样的年轻一代不忘西东、不负芳华地去探索、去追求。

是为序。

郭惠民

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协会副会长,教授

2018年8月18日

引 子

音乐和公共外交看似不同领域，却同以影响人心见长。探索二者之间产生“共振”的内在脉络和深层缘由，可为国际政治研究提供“心”的视角。挖掘艺术在政治中的潜力，亦可为激活人与人之间心灵相通的密码，创造相互包容理解、合作共赢的国际氛围提供理论借鉴。

本书尝试将音乐这一日常“可闻之乐”变为“可见之物”，呈现其在公共外交中独特的战略意义。它或担任“政治先锋”和“观念大使”角色，开启善意对话、软化敌对情绪，促进观念认同，犹似“枪炮”攻心；或担任“身份标识”和“文化桥梁”角色，塑造身份认同、分享不同文明、增进相互信任，如同“玫瑰”余香。

其艺术独立性和审美抽象性亦常常与政治权力与理念疏离。有趣的是，恰恰是这些看似超乎政治，关乎人类共通情感、灵性、愉悦、美好的价值更能照见人的尊贵与存在，更能促进国家、民族、世界向“命运共同体”理想靠近。

（此书为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阶段性成果，感谢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